

张伯衍家族的铜铭牌

王永安

2018年，在藏友孙先生家看到一块张伯衍私人订制的家族铜铭牌（见图），包浆浑厚，。牌长21.8公分，宽18.8公分，厚3公分，呈长方形，左右上方切角。铜铭牌上镌刻数百字，抄录如下：

上块顶头：“祖妣蒋老太君”；二行：“大总统题颁节孝匾额”；三行：“志节行芳”；四行：“生嘉庆甲戌年四月十六日巳时”；五行：“卒光绪戊戌年七月初八日卯时”。其右方竖字镌刻“怀宁张氏世居皖省东门外花山咀”，左方竖字镌刻“中华民国十三年七月张伯衍誌于京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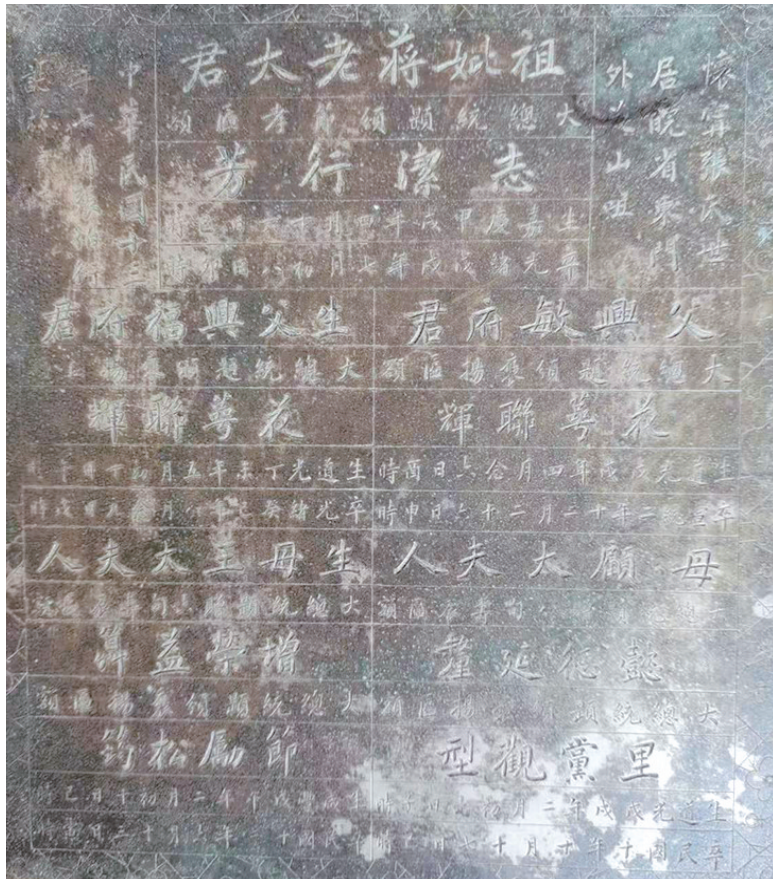
中块右方：“父兴敏府君”；二行：“大总统题颁褒扬匾额”；三行：“花萼联辉”；四行：“生道光戊戌年四月念六日酉时”；五行：“卒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申时”。其左方镌刻“生父兴福府君”及“大总统题颁褒扬匾额”“花萼联辉”“生道光丁未年五月初十日午时”“卒光绪癸巳年八月念九日戌时”等字。

下块右方镌刻：“母顾太夫人”“大总统题颁八旬寿辰匾额”“懿德延厘”“大总统题颁褒扬匾额”“里党观型”“生道光戊戌年二月初六日子时”“卒民国十年十月十七日巳时”“生母王太夫人”“大总统题赠六旬寿辰匾额”“曾荣益算”“大总统题颁褒扬匾额”“节励松筠”“生咸丰戊午年二月初十日巳时”“卒民国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寅时”。

铜铭牌上洋洋洒洒四百余文字给我们透漏如下信息：一、民国时期大总统给张伯衍家族题匾七块，其中褒扬匾五块，祝寿匾两块。二、张伯衍有生父母和养父母，从生父兴福和养父兴敏的名字来看，很可能是胞兄弟，不能确认，但至少是同宗兄弟。三、从这块铜牌获悉蒋老太君（奶奶）寿辰84岁，父兴敏寿辰72岁，生父兴福寿辰46岁，养母顾太夫人寿辰83岁，生母王太夫人寿辰65岁，生母王太夫人是1923年去世的，这与铜牌落款：“中华民国十三年七月张伯衍誌于京师”相吻合。四、这个铭牌类似于“牌位”，应该是用于供奉的，有的人家是写在纸上或红布上，这个是刻在金属上，估计当时还有底座，放在家中供奉。



民国的总统甚多，给张伯衍家族题写七块匾额的大总统究竟是谁呢？这是一个还是两个以上大总统题写？或者说这个大总统是一次还是数次题写？



二

张伯衍（1873年—1940），谱名承宗，字伯衍，安庆怀宁人，清光绪癸卯科举人，自晚清入民国，一直担任政府要职，在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1916.8—1917.6）和第一届第三期常会（1922.10—1924.11）中，张伯衍担任国会众议院议员，在安庆颇有影响，时人称其“为人潇洒，胸怀磊落”。

张伯衍曾经被委任安徽全省印花烟酒税务局长。1923直系军阀曹錕为了做中华民国“大总统”，便以5000块现大洋的价格买一张选票，收买了国会议员590人投他的票，居然如愿以偿，并于10月6日“宣誓就职”。贿选丑闻暴露后，曹錕被世人讥讽为“贿选总统”，被收买的无耻议员们则被冠以“猪仔议员”的称号。当时，在安徽省会安庆也出现几个臭名远扬的“猪仔议员”，张伯衍在这次事件中遭到冲击，家宅被学生和工人捣毁。不管当时情况出于无奈还是被迫所为，但作为一介士人，他的良心也受到谴责，脸上不免蒙上一层羞耻。曹琨贿选后，张一直居闲在家，不问政事，家境甚是拮据。时适刘镇华出任安徽省主席，秘书长是王印川。王印川原是河南省京议员，曾与张伯衍在南京相处甚久，交谊深厚，此次随刘镇华来安徽，适便造访老朋友。当他看到老朋友家境不佳，便邀请他出山。张因久不问政事，无意为官，但为缓解家庭困厄，乃自请为救济院效命。王印川为报相交情谊，特聘张为该院院长。

1938年6月12日，日军攻占安庆之后，为了推行“以华治华”的反动政策，迅速派员找到正在怀宁白麟畈逃难的张伯衍，想请他出山维持沦陷区局势，素有民族气节的张伯衍断然谢绝。随即，时年65岁的张伯衍携带家小离开白麟畈，宁可让自己颠沛流离乡村荒野与祠堂和寺庙之间，也不连累亲友。逃难过程中，张伯衍听到风声，位于安庆天台里附近的家宅也被日军侵占。眼见山河破碎，年过花甲的老人遭受着巨大精神折磨。

1940年6月29日，在外漂泊了两年多，多次拒绝敌人威逼担任伪职的张伯衍悲愤而死。老人宁死不当汉奸的民族气节感动乡里，1941年，国民政府为他颁发了“行人守义”牌匾，以示褒扬。

三

1913年至1924年，中华民国元首为“大总统”，分别是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黎元洪、曹錕。

为确认铜铭牌上的题匾到底是谁题写的，首先我们采取排除法，尽量缩小范围。

题匾的时间大致在1916年——1924年7月，其理由有二：一、张伯衍是1916年担任国会众议员，也就是在这一年他才能有资格有能力和大总统交往；其二、这块铜铭牌是民国十三年七月制作，题写的时间无疑是在1924年7月之前。细读铜铭牌上的铭文，发现两块祝寿题匾有具体时间，张伯衍的养母比生母整整大二十岁，养母八十大寿和生母六十诞辰这一年正是1918年农历二月初几。1918年

有两个大总统：冯国璋的任职时间是1917年7月6日——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是1918年10月10日——1922年6月2日。按照民间做寿的风俗，“男做九女做十”或者“做九不做十”的习俗，张伯衍给两位老人做寿应该是在1918年农历二月之前，也就是说大总统题匾的时间亦是在此之前，根据这一推测，冯国璋大总统题写匾额的可能性更大。这一推测有个证据支撑：1918年3月6日《申报》上刊登了一则“皖垣公卖局长张伯衍因其生母六十及母八十先后寿辰定于月之六日称庆”的启事，可作印证。

但问题是，一个众议员和一个大总统必定是有阶层差别的，众议员充其量是社会名流和贤达人士，而大总统是有权有势能左右这个国家的重量级人物。两者虽有差别，但彼此又有关联，大石头总是需要小石头围脚，大总统也是需要众多的议员支持，否则就寸步难行，这也给议员与大总统交往提供机会。一个议员与大总统交往需要一个机缘或者说一个媒介，而这个机缘和媒介就是段祺瑞。

张伯衍与段祺瑞同是安徽人，属于“老乡”，有关史料和历史小说记载，段祺瑞经常利用张伯衍的国会议员身份和黎元洪作对就是一个佐证。再说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被称为“北洋三杰”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段祺瑞把张伯衍介绍给冯国璋三方都划算，段有了耳目，冯又多了一个议员朋友支持，而张伯衍又能和同是读书人的大总统冯国璋交往，何乐而不为？

张伯衍一生也是坎坎坷坷，二十岁时（1893年）他一喜一悲，喜的是这一年他考上举人，悲的是这一年他的生父张兴福去世，五年之后（1898年）他的祖母蒋老太君过世，十七年（1910年）之后，他的父亲张兴敏过世。1916年时年43岁的张伯衍当上国会议员，从此他步入仕途。张伯衍是一个孝子，1918年他事业上如日中天，这一年农历二月初六，他给养母和生母大办八十寿辰和六十寿辰，其中请大总统冯国璋给他养母和生母题写寿匾就是做寿的一项重要内容。毫无疑问，很大程度上大总统给两位老人祝寿题匾和褒扬匾是一次题写的。至于大总统给他养父和生父两块褒扬匾以及一块给他祖母题写的褒扬匾共计三块褒扬匾是一次题写或者说是几次题写都有可能。总之，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可以说张伯衍制作这块铜铭牌是有准备的。民国十年、十二年，张伯衍的养母和生母相继逝世，他的尽孝责任也随之完成，于是民国十三年七月他在北京镌刻这块铜铭牌，记下家族的辉煌与荣耀。十七年之后1941年，国民政府为张伯衍颁发了“行人守义”牌匾，以示褒扬。